

日据时期(1922年以前)台湾 农家经济与“米糖相尅”问题

周翔鹤*

“米糖相尅”问题是日据时期台湾经济中的一个尖锐突出的问题,它“几乎横亘了整个日据时期的台湾经济中”^①，“研究日据时期的台湾经济学者,无不重视这一问题。”^②所谓米糖相尅指的是日据时期台湾最重要的稻米和蔗糖两个部门冲突的问题:当两个部门都要扩大生产时,就在耕地上形成了冲突——究竟是多种稻还是多种甘蔗?这个冲突的一个前提是农民可以选择他们所偏好的作物——稻或甘蔗,或其他作物。本世纪初,当日资现代化大制糖厂开始在台湾发展时,为了保证糖厂有充足的原料,殖民当局——台湾总督府制定了“原料采取区域制度”,该制度将全岛划成四十多个原料采取区,一个区域内的甘蔗不可以运出区外,也不可以移作它用,而只能卖给该区域内的制糖厂。这个制度虽然使日资糖厂对区域内的原料甘蔗有了垄断权,但农民如果觉得不合算,也可以不种甘蔗而改种其他作物。由于制糖厂81%的甘蔗依靠农民提供,因此农民选择稻米或其他作物时对制糖厂的原料来源就形成威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甜菜减产,世界糖价暴涨,日资糖厂急欲扩大生产时;以及20年代台湾推广蓬莱米种,农民纷纷改种稻米时,日资糖厂都痛切地感到了这种威胁的存在。

“米糖相尅”问题对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关系甚大,战前日本学者对此问题就有许多研究。他们主要从两个角度切入这一问题。以川野重任为代表,主要从价格均衡角度研究米糖关系,他认为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米和糖的价格能达到一种均衡关系,从而定位米糖的生产而使相尅关系得到缓和^③。而根岸勉治、矢内原忠雄等人则注意稻蔗比价。根岸勉治通过统计分析发现甘蔗收购价格与糖价相关程度甚低($r=0.55$)而和米价相关程度甚高($r=0.91$)。他和矢内原忠雄等人认为,当米价升高时,制糖公司只有提高甘蔗收购价格,否则农民将放弃蔗作转向稻作^④。根岸和矢内原的研究都是以经典资本主义发展理论为基础的。他们认为,糖业资本的发展必然促使蔗农分化,其大部分将沦为制糖厂甘蔗种植园的农业雇工,而资本主义种植园的形成将使得资本主义在台湾的工业和农民能达到一致的发展。历史已表明他们推断的情况并未出现。对于战前的日本学者来说,米糖相尅问题是一个现实的经济问题,他们在探讨这一问题时,或因过于敏感而欲避开其包含的政治因素;或因过分注重现实而忘了历史前提,使得他们的研究难免有所局限。比如川野重任在应用价格均衡方法时,忘了在殖民地台湾的稻米、甘蔗价格并非由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的,而是由总督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操纵的^⑤。

相对的,战后台湾学者对“米糖相尅”问题的研究的最大特点,就在于抓住了日据时期台湾经济的殖民地本质。旅日台湾学者涂照彦指出,作为殖民地的台湾,米和糖的生产都是服从宗主国日本的需要。日本自身不产糖,糖的进口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此占据台湾以后

* 作者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研究人员。

就努力发展台糖,台糖最后占日本糖消费量的 90%左右。台湾的稻米对日本虽然没有台糖重要,但台米于每年青黄不接时输日,对于抑制日本的米价是很重要的。20 年代,日本在向帝国主义转化的阶段是非常需要低米价的。因此“米糖相尅”并非殖民地台湾本身的经济问题,而应从日本帝国主义演化的高度来看待:当日本帝国主义要求殖民地台湾同时生产更多的米和糖时,相尅就发生了^⑥。

同样的,柯志明运用依附发展理论的功能性二元经济论(functional dualism)来探讨这一问题。他所依据的分析前提是殖民地的经济结构由于与宗主国的关系而被扭曲,部门发展的不一致以及整体经济的失衡是其不可变易的特性,这是由于外来的支配与资本运作的逻辑造成的。对于米糖相尅来说是日资糖厂企图不通过提高蔗田生产力,而在压低蔗价时通过扩大蔗田面积来达到增产的目的。由于蔗田收入决定于米田收入,在这样做时就必须压抑米价,这在 1902 年以前和 1935 年以后是成功的。

毫无疑问,由于台湾学者把握了日据时期台湾经济的殖民地本质,他们解决了米糖相尅问题的分析前提。在这个前提下,所谓相尅的实质就是台湾农民的利益和日资糖业资本利润冲突的问题。“糖业资本考虑的是在寻求满足必要的原料需求而扩张产量及耕地面积时如何减低成本的问题”^⑦。而台湾农民寻求的是选择作物,提高土地收益以维持生计的问题。两者的冲突通过米蔗比价而表面化。那么米蔗比价的决定基础又是什么呢?这是柯志明先生提出来的问题。他指出,日本学者或因此一问题触及敏感的政治因素而避开,或脱离日据时期台湾经济的殖民地背景而归诸市场机制,都未能解决此一问题。他指出:“收入比较才是关键,不是价格的比较;而决定收入的两大因素,分别是收购价格及单位面积生产力(按:指单位面积产量)”^⑧。在米价提高,米田生产力提高时,糖业公司可以采取提高蔗田生产力的方法应付,但这要求投入大量的成本,因而制糖公司宁肯采用更损人利己的办法——阻碍稻田生产力的提高。

一般而言,台湾学者多从宗主国日本或日资糖厂的角度切入此一问题,作出深刻的分析。但既然冲突涉及双方,我们亦不可撇开台湾农民这一方,从自身的利益出发,究竟他们应如何抉择,如何决定他们的行为方式。这就要求我们对农家的经济行为也作出一个整体性的分析。这个分析不但要从农家经济行为的一般性原则出发,也要紧紧把握日据时期台湾殖民地经济结构这个前提。对殖民地政权通过政治和行政手段干涉,介入农家经济生活已有许多揭露、分析,本文重点在于分析殖民地经济结构的属性如何制约、渗透农家的经济行为。

本文的方法和使用的材料

对于农家经济行为的一般性研究存在许多学派。以美国学者舒尔茨为代表的形式主义经济学家认为传统小农如同企业家一样,能够合理地运用他们掌握的各种生产要素以求达到最大的收益,从而传统的小农的现代化改造将使整个农业现代化并为经济的发展提供积累的源泉。而以俄国学者蔡雅诺夫为代表的实体主义经济学家则认为小农经济不适于研究资本主义企业的经济学说,小农家庭的生产投入和收获都难以明确划分、计算。最重要的是,小农经济的目的在于生计的维持和家庭的消费,而不是追求最大利润。假如抽象掉两派学者的理论追求,我们得到的将是一个具体的综合分析方法:农家经济是一个能尽量利用他所掌握的生产要素,追求更大收益以维持家庭生计的小经济个体。虽然农家全年投入的劳动很难区分为一个劳动单位的成本,其所生产的农产品也不易象现金一样按单位计算,但在农家日记帐的基础上,还是有可能采取类同资本主义企业会计的方式对农家经济进行周密的调

查。本世纪以来许多这类尝试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当然,对这种材料的使用并不一定要导向形式主义的结论。五十年代,台湾学者张汉裕博士在对战后台湾米糖比价进行分析时说,农家经济的平衡在于实物收支和现金收支两方面的平衡^⑩。这是一个实体主义的立场。农家的实物付出包括他生产的农产品,他积的农家肥,他养的家畜家禽等等以及他的劳动,而现金对于农家来说往往是稀缺的。因此,农家经济的良性运转就是更多地利用自家的产物和劳动来换取现金和农产品。张汉裕博士所利用的材料是战后“台湾省农林厅”的“农业基本调查”。该调查和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殖产局的农家经济调查相同,都是采用类同企业会计方式的形式主义方法,但却不妨碍张汉裕博士作出实体主义的分析结果。这也就是本文所要采取的方法。

本文所利用的材料是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殖产局在1918年4月—1921年4月所做的“台湾农家经济调查·第二版”^⑪。该调查的对象农户分布全岛,共有稻作、蔗作、茶作、杂作四类农家124户。本文的目的在于稻作和蔗作的对比,因此不涉及后两类农家。被调查农家包括自耕农、自耕兼佃耕农、佃耕兼自耕农、佃农及地主各个阶层”。由于佃农和地主的调查对象较少(稻作佃农2户,蔗作地主2户,佃农3户,且3户全位于台东日本移民村。)一户农家偶然的丰歉或某种重大经济举措,都将引起平均数字的重大变化,难以反映一般实际情形,本文只得将研究对象限于自耕农和半自耕农(稻作59户,蔗作20户)。农家经济调查对农家生产、生活各方面的统计是比较详尽的,本文只讨论农家的生产,对生活方面不予涉及。当代形式主义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将生产要素的投入分为土地、企业家的才能、资本和劳动四个方面($P=f(L,K,N,E)$)。我们将以此为框架来讨论农家的生产。农家经济调查的各种数据也将按这个框架处理。当然,农家经济毕竟和厂商企业不同,有些项目难免出现不同的涵义和计算方式,这将在下面的具体讨论中予以说明。

农家要素投入的分析

一、土地:台湾农家大多数经营小块的土地。1920年—1930年,25%的农家仅拥有0.5甲的土地,(1甲约等于11亩),20%拥有0.5—1甲,30%拥有1—3甲,16%超过3甲^⑫。后者当中自然包括许多地主,但他们也将土地分成小块租给佃户。农家经济调查的33户自耕农户,经营3甲以下土地的有20户,占60.6%;3—6甲的有12户,占36.36%;6甲以上仅有1户。蔗农经营的土地面积较大,绝大多数经营面积在2—4甲左右,6甲以上的也仅有1户。半自耕农经营的土地面积稍大一点,稻农中经营面积3甲以下的有9户,占34.6%;3—6甲的有16户,占61.5%。从经营土地面积来看,大多数农家为中等状况。所谓稻农、蔗农实际上是以稻或蔗为主,兼种其他作物。有的农家经营的作物竟达10种,说明农家是尽量利用土地,许多作物是利用边角小块土地经营的。

按照企业会计原则,土地应计算其价值额,并计入其每年的利息。第一次农家经济调查中就曾对农家的土地进行估价。结果估算的价格比农家其他财产都高出一个数量级,在自耕农中,土地价值往往占农家资本总额的95%以上^⑬。在第二报中(即本文利用的材料),殖产局已认识到这样做违背农家经济运作的实际情况。农家土地的价值难以评定,硬性规定一个价值并计算其利息结果必将歪曲农家经济,因此,在第二报中就取消了这一项目。确实,土地是农家生存之本,其价值不能按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原则来计算。日资糖厂最初发展时亦曾打算购买土地自己种植甘蔗,但由于传统农家观念上轻易是不出让土地的,地价十分高昂,超过企业会计原则,日资糖厂只得作罢。日资糖厂虽然获得当局无偿供给的荒地,进行开垦。

拥有自己的一些蔗园,但制糖业的绝大多数原料甘蔗还是要靠农家提供的。日本殖民者当中也有人鼓吹利用暴力强制推行大种植制度。但殖民当局意识到这样做的结果势必引起台湾人民的反抗而危及殖民统治,因而未采纳其建议^⑬。传统观念和小农经济模式使得台湾农家牢固附着于土地,无论殖民当局或日资糖厂都无法将土地从他们身上剥离。

二、才能:对于农家来说,才能主要指农业生产技术和商品化背景下对市场适应的本领。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本文的主要议题,因此这里主要谈农业技术问题。日据时期,台湾农业还是依靠小农采取传统的牛耕加人力的小规模家庭耕作方式,但无论水稻或甘蔗的种植技术都有很大的提升。这个提升有两个特点:一是对农家来说是被动的;二是水稻和甘蔗种植技术的提升和推广并非平行一致。甘蔗和水稻的新品种都是当局引进,驯化成功,然后通过行政手段强行向农民推广的。1920年以前,当局主要通过警察与保甲,配合农业技术员(大多是日本人且担任基层政权职务)对农家进行严格的监督和有系统的指导。1920年以后,这些工作多由农会承担。

水稻种植技术的重大变化和发展是1922年蓬莱米种驯化成功,推广以后的事。在此之前,当局在农业上的注意力主要放在甘蔗上。占据台湾的次年,1896年,当局即从夏威夷引进玫瑰竹种甘蔗,经培植后于1902年实行无偿配给,加以推广。1912—1913年期间,玫瑰竹种已占甘蔗种植面积的96.2%。1913年以后又引进能抵抗台风的爪哇细茎种,1916年开始配给。1917—1918年间,爪哇细茎种占甘蔗种植面积的14%,而玫瑰竹种占81.7%。配合新蔗种的推广,当局同时以行政手段鼓励甘蔗施肥、灌溉。传统台湾种植甘蔗是几乎不施肥不灌溉的,只用些粗糠、稻草、草木灰、烧土之类培植杂草性作物的肥料,简单地维持甘蔗的生产。总督府的糖务局考虑到农民墨守成规,不懂肥料的效果,不愿花钱购买,因而糖务局自己购进适当的肥料,以一定的条件分配给蔗农,对蔗农加以促进。自1903年起并实行现金补助。1904年以后,由当局承担进口、检查以及分配等事务,以翰旋共同购买。1912年起诸般事务都转移给制糖会社。1916年停止补助。在上述甘蔗品种改良和促进施肥期间,稻谷方面的技术变化是在米种(台湾原有米种)改良,其中心是米种限制。从农业科学上来讲,传统台湾米种繁杂,竟达4000多种。混杂播种,成熟期不一,降低了产量。当局限制米种大约分两个阶段:1906年起限制红米;1910年起限定品种数目,并在选定的品种中剔除异种。选定品种的标准是高产且米的形粒和日本米相近,以便输出到日本。以台南厅为例,至1916年“第一次米种改良限定数第一季181种,中间种85种,第二季219种,共485种,比以前减少了880种。减少红米的工作成绩也颇为显著,大体已告剔除。其后随工作的继续反复,品质、收量都见改进。”^⑭配合米种改良,当局在鼓励稻田施肥方面也进行了工作,但同样大大不如蔗作方面。当局于1908年开始奖励绿肥栽培,1920年开始对猪舍、堆肥舍的设置给予补助^⑮。凡此,皆为鼓励农家肥的措施。稻田的集约施肥及肥料商业化的大幅度提高,都是蓬莱米推广以后的事。

三、资本、劳动:由于农家经济的生产部分和生活部分难以截然分开,因而农家的生产资本如何判定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日据时期殖产局和战后“台湾省农林厅”的调查所列出的“农业资本”项目有建筑物、动物(牛、猪、羊、鸡、鹅、鸭)、植物、农具、现物(种苗、肥料,尚未卖出的农产品等)和现金。现金以外诸项均按时价折成相应的价额。以上诸项,现金所占比例为最小,建筑物所占比例为最大。殖产局调查的68户稻作农家中,调查时没有现金的50户,现金比例不足1%的5户,不足10%的8户,三者共占调查户数的92.65%,蔗作农家的相应数字是84%,所以现金对农家是非常稀缺的资本。农家手头经常没有现金,他们只有在

农作物收获并卖掉之后才有现金作为生产和家计的投入。而建筑物在农业资本中所占份额最大,但其作用却颇有争议。在被调查的 68 户稻农中,建筑物占资本总额 50% 以上的有 11 户,30—50% 的有 15 户,二者共占 82.25%,蔗农的相应数字是 96%。所谓建筑物主要指农舍,因它主要用于住居,属生计部分,所以张汉裕博士怀疑它是否能列入农业资本之中。他在考察战后台湾米糖比价时就把农舍从农业资本中去掉。上列各项资本中,建筑物、农具可视同固定资本^⑩,每年应有折旧、维修费用;其余诸项为流动资本,每年都应有投入。虽然农家调查将农家经济的运作类同于厂商企业,但二者之间毕竟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区别。企业的运转经营中,原材料、固定资本折旧维修、工人的劳动等均以货币购买,而农家运作中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均包含自给和购入两部分,另外,农家的劳动显然也包含自给(自家的劳动)和购入的劳动(雇请的帮工)两部分。在类同企业会计的农家调查中,不但统计购入的实物和劳动的费用,同时将农家自给的实物和劳动也折合成相应的费用而计入。固定资本折旧维修、流动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再加上赋税和地租的负担,此即农家常年的农业经营费用。稻农和蔗农农家经济运转的好坏,主要就在于常年农业经营费用的收支情况。殖产局的农家经济调查中“农业经营费”表^⑪中,列有种苗费、肥料费(以上两项属农业资本中的现物项目)、畜产费(动物项目)、农具费(农具项)、建筑物费(建筑物项目)及劳力费(包含耕牛力)以及赋税和地租等栏目、此即我们要研究、比较的对象。

就企业而言,总产值固定的情况下,原材料消耗和购买工人的工资越少,纯产值以及纯利润随之也就越大。原则上这也适合于农家经济,不同的是,农家经营中,自给的部分越大,购买的部分越小,农家经济就越易趋于平衡而获益。因此,对台湾农家来说,他们在选择种稻或种蔗时,不但要考虑谷价和蔗价以确定总产值,同时还要考虑哪一种作物能更多地利用自给的实物和劳动,减少购入,增大收益。为此,我们应当比较种蔗和种稻的常年农业经营费,首先研究农业经营费中各种项目构成的比例,其次研究各项目中自给和购入的比例。二者结合起来,就可以大致观察出种蔗或种稻经营的优劣比较了。

根据“农家经济调查·第二报·第六表”中的稻作农家和蔗作农家农业经营费表格,我们求出各阶层农户平均农业经营费中各项目比例结构如下:

表一:各阶层农户农业经营费各项目百分比(%)

1、自耕农

	种 苗	肥 料	劳 力	农 具	农 舍	畜 产	赋 税	地 租
稻作:	3.7	11.41	62.36	1.65	2.95	8.52	7.4	—
蔗作:	4.5	17.15	54.27	1.53	4.56	10.13	8.28	—

2、自耕兼佃耕农

稻作:	2.22	11.89	53.27	1.93	3.54	9.51	7.51	10.46
蔗作:	7.4	18.66	56.01	1.61	1.83	3.22	5.38	7.82

3、佃耕兼自耕农

稻作:	1.99	11.875	31.81	0.92	2.09	5.625	5.38	40.66
蔗作:	7.6	23.29	28.01	3.95	3.43	14.74	6.36	12.57

资料来源:据台湾总督府殖产局《台湾农家经济调查·第二报》第六调查表,一、米作农家之七·农业经营费;二、蔗作农家之七·农业经营费两表制成。

根据上表,无论稻作农家或蔗作农家,农业经营费中的最大项目都是劳力,它超出其它项目许多,呈现出小农经济的特点。其次是肥料,这表明商业肥料已进入农家的经营之中。

而无论稻作或蔗作,自耕农及自耕兼佃耕农两个阶层的劳力费和肥料费之和都占据了农业经营费的70%左右。佃耕兼自耕农因沉重的地租负担,其他项目的比例皆有所下降,但此二项费用之和同样占据农业经营费中的最大部分。因此,我们对稻农、蔗农农业经营费的比较,只须比较这两项就足够了。只要这两项的自给部分大,农家经济就越易趋于平衡。那么稻农和蔗农在这一方面的情况分别又是如何呢?据同一调查材料,他们肥料和劳力的自给和购入的构成情况如下:

表二:各阶层农户购入肥料占肥料百分比(%)

稻作自耕农:39.6	稻作自耕兼佃耕农:33.4	稻作佃耕兼自耕农:67.86
蔗作自耕农:49.75	蔗作自耕兼佃耕农:73.5	蔗作佃耕兼自耕农:70.87

表三:各阶层农户自给劳动占总劳动百分比(含耕牛力)%

稻作自耕农:76.77	稻作自耕兼佃耕农:77.1	稻作佃耕兼自耕农:68.87
蔗作自耕农:70.88	蔗作自耕兼佃耕农:48.16	蔗作佃耕兼自耕农:59.33

资料来源:同表一。

据表二、表三,蔗农无论购入肥料或购入劳力的比率都比稻农要高。

如前所述,蔗农购入肥料比率高,是因为当局为促进甘蔗产量而推进商业肥料的结果,而1922年蓬莱米推广之前稻作里还没有出现推进商业肥料的情况。据统计,蓬莱米推广之前蔗田里使用化肥、豆饼的密集程度超出稻田许多。

表四:每单位面积消耗的肥料,年平均数(Kg/hect)

(1922—1944年)

	稻田	蔗田		稻田	蔗田
豆饼	72.72	100.23	过磷酸钙	17.33	34.81
硫酸铵	0.88	59.91	混合化肥	2.57	439.94

资料来源:台湾总督府《台湾农业年报》转引自何保山《台湾的经济发展》。

蔗农的肥料费用占农业经营费的百分比和购入肥料占肥料总量百分比都比稻农高,这就使得蔗农要比稻农支出更多的肥料费用。

其次来看劳力费,据表三稻农自给劳力费比率要比蔗农高,说明蔗农比稻农须购入更多的劳力。这个购入的劳力费中包含购入耕牛力的费用,但购买耕牛力的费用非常小,许多农家不需要或仅需要雇极少的耕牛力。据同一调查,雇用耕牛力费用占购入劳力费用的百分比如下:

表五:各阶层农户雇耕力费占雇用劳力费百分比(%)

稻作自耕农:3.12	稻作自耕兼佃耕农:0.5	稻作佃耕兼自耕农:0
蔗作自耕农:1.6	蔗作自耕兼佃耕农:1.5	蔗作佃耕兼自耕农:2.83

资料来源:同表一,第六调查表一之二,二之二。

根据表五修正表三,我们可以得到农家自家劳力(不含耕牛)占总劳力(不含耕牛力)百分比的情况如下:

表六：各阶层农户自给劳力(不含耕牛)百分比(%)

稻作自耕农:77.49	稻作自耕兼佃耕农:77.21	稻作佃耕兼自耕农:68.87
蔗作自耕农:71.35	蔗作自耕兼佃耕农:48.94	蔗作佃耕兼自耕农:60.48

因此,稻作农家比蔗作农家更充分地利用了农家的劳力。

其实不但自给劳力,就是自给的实物里也包含了许多农家的自给劳动,如肥料中的自给部分是自积的农家肥,建筑物和农具费当中的自给部分是自己维修的工作,种苗中的自给部分是自己培植的等等。

正是在劳动的问题上,形式主义经济学家和实体主义经济学家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形式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农家的许多劳动已达边际报酬为负数的区域,毫无利润可言。而实体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农家经济的目的并非利润而是家计,他们付出超量的劳动(蔡雅诺夫所谓的“自我剥削”)是为了减少支出,增加产出以维持生计。

农家能否充分利用自家劳动,对其家庭经济运作至关重要。日据时期台湾的稻作农家若更能充分地利用自家劳力,其所能获得的农业纯收入也就更高,其情况有如下表:

表七：农业纯产值相比以现金支出的农业经营费

(相对每百元现金的纯产值)(元)

	多	中	少
稻作:	1000—700	600—300	66—20
蔗作:	500—300	250—200	110—16

资料来源:同表一,第四、六。

蔗农和稻农自家劳动利用率的差别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农业劳动的季节性分布不平均,尤其是收获季节需要大量的劳力。甘蔗是笨重之物,无法依靠自家的劳力收获。同时,甘蔗的特性是含糖分最高时如不立即收获或收获后不立即压榨,糖分会立即下降。传统台湾农家种有一定数量的甘蔗时,一般是轮流收获,互相利用劳力。而日据时期,日资糖厂用甜度计不断测定农民蔗园里的甘蔗,在糖分最高时立即派人派车收割装运,而费用都由蔗农承担。传统台湾的蔗农多参加共同体式的糖廊——牛犛廊或牛挂廊,他们的家庭劳力能在制糖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利用,日资糖厂建立后,台湾蔗农成为原料甘蔗提供者,被排除于甘蔗加工阶段,他们在加工阶段的劳动就被剥离。不仅如此,由于他们需购入更多的商业肥料和劳力,他们在甘蔗种植阶段的许多劳动也被剥离了。日资糖厂无法从农民身上剥离土地,但却能剥离更多的劳动而控制他们。

结 论

日据时期台湾农家经济是高度商品化的,蔗农不但出售他们的全部甘蔗,也出售他们兼作的稻米、番薯等,稻农同样也出售他的大部分稻米和其他兼作的农作物,然后从市场买回他们需要的米和其他农产品。

表八：农作物贩卖比率(%)

	米	番薯	花生	水果	蔬菜	甘蔗	农作物出售总比率
米作农:	78.2	43.57	—	82.62	46.4	100	65.3
蔗作农:	63.3	62.5	63.5	—	82.0	100	85.5

资料来源:同表一·第五·五。

对如此高度商品化的农家经济来说,农产品价格和产量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决定了农家的农业总产值。但农家所得的纯产值还取决于他的经营费。总产值扣除了农业经营费,才是农业纯产值。柯志明先生指出了稻蔗比价的决定基础在于价格和土地生产力(单产),我补充了生产成本,即:

土地收益=农产品收购价格×土地生产力-生产成本

在殖民地经济结构中,由于生产要素的商品化使得农业生产成本上升,假如生产要素集约化能相应地提高单产,那么纯产值不一定因生产成本的提高而下降。但殖民地的农产品价格取决于宗主国和垄断资本企业。日据时代台湾的蔗价由各原料采取区域内的日资糖厂决定^⑬,他们采取了蔗价跟随米价的方式,因此蔗农假使实行集约化经营亦无把握获取相应的报酬,而日资糖厂可以稳获低价的甘蔗。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没有种蔗的积极性。这就是米糖相尅的实质——日资糖业资本利润和台湾农民收益的冲突。

1922年以前,由于殖民当局集中发展台湾制糖业,因此,农业生产要素商品化主要发生在蔗作业里。1922年蓬莱米驯化成功推广以后,因蓬莱米需要更多的肥料和灌溉,因此稻作里的生产要素商品化程度也迅速提高。但因蓬莱米价提高,使得稻田总产值也增高,这就使得稻蔗比价决定基础重新发生变化,而米糖相尅也呈现一轮新的图景,对此,容当另文分析。

(本文承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吴文星教授提供资料,特此申谢。)

注释:

①③川野重任《台湾米谷经济论》,台湾研究丛刊第102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

②⑤⑦⑧柯志明:“所谓的‘米糖相尅’问题:以日据台湾作为一个依附发展的例子”,《台湾风物》第40卷第2期。

④根岸勉治:“日据时代台湾农业企业与米糖相尅关系”,据《台湾银行季刊》第9卷第4期译文。

矢内原忠雄:《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台湾丛书译文本第一种,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出版。

⑥涂照彦《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人间出版社。

⑨张汉裕:“台湾米糖比价之研究”,《台湾银行季刊》第5卷第4期。

⑩台湾总督府殖产局:《台湾农家经济调查·第二报》,农业基本调查第五,大正十二年(1923年)5月刊。

⑪参阅何保山《台湾的经济发展》·4现代农业的形成,上海译文出版社。

⑫台湾总督府殖产局:《台湾农家经济调查第一报》,农业基本调查书第一。

⑬事实上林本源制糖会社成立时因强行收买农民的土地而引起骚动,导致糖务局长引咎辞职。

⑭⑮“台南厅农会第一次米种改良事业成绩,1916年。”转引自献生“日据时代台湾米谷农业技术开发”,《台湾银行》第9卷第2期。

⑯农具中的大农具应归入固定资本,小农具应归入流动资本。但殖产局和农林厅的调查都没有区分大、小农具,因此只得将他们归为一类。

⑰台湾总督府《台湾农家经济调查·第二报》·第六调查表,一、米作农家,(七),农业经营费;二蔗作农家(七),农业经营费等。

⑱在决定甘蔗收买价时也邀请一位蔗农代表,但显然他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

(责任编辑 高群服)